

大河上下：10世纪以来的北方城乡与民众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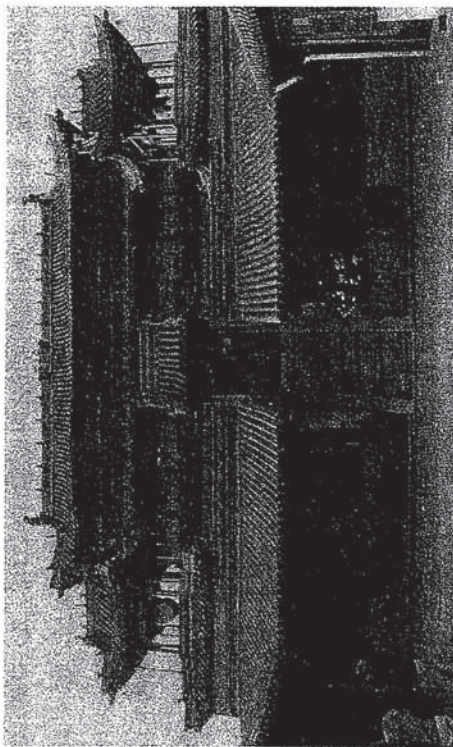
“耆老”成为地方的精英阶层，他们威望很高，有着雄厚的经济实力，不仅与地方官员交游甚密，而且在村落中有很强的组织动员力，对于乡里兴修水利、重建神庙等方面的地方事务，以及祈祷雨晴等习俗传统都有着广泛的影响。

明清之际可以说是高平地方权力格局重组的一个重要关节，明末频繁的战乱严重破坏了地方原有的权力格局和信仰系统。金元以来在村落中拥有雄厚实力的乡耆大姓，许多也因为明末的战乱而家道中落。另外一部分人则经过明代科举考试获得功名，成为一批新的乡村精英。这些地方精英借由明初的里甲制和明中后期工商业的发展，实力不断壮大，成为推动村社扩张最主要的一股力量。他们往往充任村社的社首、维首，主导着社中各项公共事务的处理。至清中后期，一方面，庙宇的创建、重修不再是个别人、个别群体施善捐资的私人行为，而是变成由村社组织的、村民普遍参与的，依照一定的社规，村社均摊需要的经费和人工的公共工程；另一方面，庙宇的职能因为村社的全面进入而大大扩展了，从过去的祭祀信仰中心到公议社规、调处村落间的矛盾的场所，村社甚至承担起整顿治安、催征粮银、重建灾后社会秩序的责任。

## 从“官军之庙”到“商人之庙”

——从蔚县玉皇阁之例看华北边镇的社会变迁

蔚县地处河北省西北部，张家口地区的最南边，古称蔚州，也称蔚萝。今日蔚县的北城垣上有一座玉皇阁，气势恢弘，整体建筑保存相当完整，分前后两院，建筑在同一中轴线上。前院由天王殿、东西厢房等组成，后院正北耸立着玉皇阁正殿<sup>①</sup>。玉皇阁创建于明初，明清两代历经修葺，皆立碑铭志。这些重修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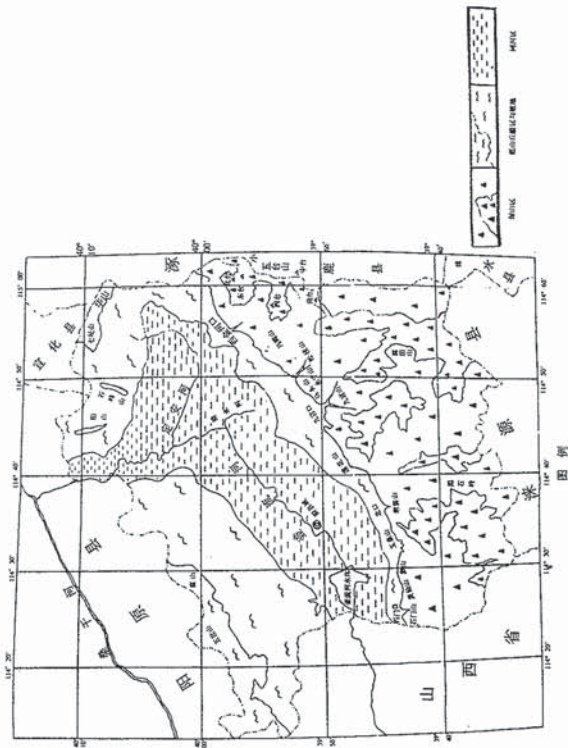


蔚县玉皇阁

<sup>①</sup> 蔚县玉皇阁由于历史悠久、保存完好，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因而受到一些古建筑研究者的关注，纷纷著文评说。如赵鸣：《古城名刹蔚州玉皇阁》，《古建筑技术》，1997年第4期；韩立基：《蔚县城垣与玉皇阁》，《文物春秋》，1994年第2期。



民族与中原王朝之间干戈不断的战场，其地也在不同政权间频频易手<sup>①</sup>。



蔚州主要山川和关隘简图  
(资料来源：《蔚县自然地理》附图，《蔚县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1986年)

明初洪武二年（1369），明军攻至蔚州城下，元蔚州知州楚宝善举城归附<sup>②</sup>。其后，该地辖境被分割为民政与军事两套系统，即隶属于山西大同府的蔚州和隶

① 战国时，为抵抗匈奴，赵襄侯修筑长城于蔚境南部。汉武帝时蔚地曾陷于匈奴。东汉建武二年（27），将军王霸曾“弛刑徒六千余人，与杜茂治飞狐道”，以防备匈奴。注云：“飞狐道在今蔚州飞狐县，北通勃州怀戎县，即古之飞狐口也。”（参见《后汉书》卷20，“魏郡王霸祭遵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737—738页）东汉建安二十三年（218），蹋顿保曹彰征讨代郡的乌桓部族，将其赶至桑干（桑干河与壶流河汇合处西南）。西晋刘琨征讨石勒，赶走飞狐。隋末其地陷于突厥，唐贞观五年（632）破突厥，复故地。此后突厥与唐朝军队还屡屡在此交战。乾符四年（878），沙陀人李克用开始进犯中原，蔚地自此沦为战争割据地。契丹兴起后，屡次南征。后唐庄宗天祐十三年（917），“阿保机攻晋蔚州，执其振武节度使李嗣本”（参见《新五代史》卷72，“四夷”，中华书局，1974年，第887页）。后晋高祖天福三年（938），石敬瑭将勃、儒、云、蔚等十六州并图籍献于契丹。宋太宗雍熙三年（986），宋伐契丹，由重进兵飞狐道，四月“至蔚州，其牙校李存璋、许彦钦杀大将萧瑛理，执其监城使、同州节度使歌绍忠，以城降”（参见《宋史》卷5，“太宗本纪二”，中华书局，1985年，第78页）。

② 乾隆《蔚县志》卷30，“艺文·重修城隍记”，《蔚县方志丛刊》边疆方志之二十八，台北：台湾学生书局据乾隆四年刊本影印，1969年，第631—632页。

大河上下：10世纪以来的北方城乡与民众生活

都树立在玉皇阁后正殿门口两旁的碑亭里<sup>①</sup>。碑刻展现了历次重修玉皇阁的过程，而各次重修时，都有不同的群体参与进来。这些参与者的身份以及玉皇阁在当地社会中具有的功能都随着蔚州社会的变迁而逐渐发生着改变。本文将通过解读玉皇阁的历次重修碑，透过这座庙宇的演变呈现明清华北边镇要塞之一——蔚州的社会历史变迁轨迹。

## 一、从“靖边楼”到“玉皇阁”

蔚县地处冀西北山间盆地南部，地形复杂，恒山（古称常山）余脉由晋入蔚，分南北两支环峙四周。境内的主要河流——壶流河，发源于山西广灵县，自西南由暖泉镇流入蔚境，横贯西东，“曲环城北，复折东南，由定安县西界汇入桑干”<sup>②</sup>。蔚县的山川形势使得该地形成了南部深山、中部河川、北部丘陵三个不同的自然区域。南部山区中自西南向东北密集分布着石门山、玉泉山、翠屏山、黑石岭、莲花山、九宫山、小五台山等许多山峰，崇山峻岭，蜿蜒曲折，阻隔了南北的交通。在这些广袤延绵的群山之间盘亘着松口峪、九宫口峪、北口峪等数个隘口。这些隘口历史上是山西与蒙古通往华北平原的必经之地，故蔚州“素为临边用武之地”。古人曾这样评述蔚县地理位置的重要性：“蔚，古代郡也，后控大漠，为负险之邦；前邻常山，号宝符之地。”<sup>③</sup>正是由于独特的自然环境及沟通华北平原与蒙古交通的咽喉位置，使得蔚县自古以来就成为塞外游牧

① 现存玉皇阁的历次重修碑刻共8通：明嘉靖二十三年《蔚志崇德祠碑》；明万历四十二年《蔚萝重修北城垣玉皇阁神祠碑志铭》；清康熙五十八年《重修蔚州北城玉皇阁碑记》；清乾隆三十二年《重修城北玉皇阁配室碑志铭》；清道光二十五年《重修玉皇阁碑记》；清光绪二十三年《蔚州正堂出示晚谕碑》；清光绪二十三年《重修蔚州北城玉皇阁碑记》。现收录于邓庆平编录：《蔚县碑铭辑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80—81页，第92—97页，第100—111页，第114—117页，第120—129页。

② 顺治《蔚州志》上卷子集，“方舆志·山川”，清顺治十六年刻本，第17a页。  
③ 崇祿《蔚州志》卷1，“舆图”，《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续编》第1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第328页。



属于万全都司、受宣府镇节制的蔚州卫，所谓“分州之余以为卫也”<sup>①</sup>，州卫同城而治。据史料记载，首任蔚州卫掌印指挥使为周房，无为州（明南直隶庐州府，今安徽无为县）人，由指挥同知洪武七年任蔚州卫<sup>②</sup>。周房到任后，对于经历战乱的蔚州社会进行了全面的重建和调整；如修筑“雄壮甲于诸边”的蔚州城，同时也是蔚州卫城。嘉靖年间的御史杨百之曾为蔚州城撰写《重修城楼记》，介绍了周房修筑蔚州城的情况：

甲寅始设卫，领五千户所。指挥周房因旧址筑城……城四面中央各建重楼，下则辟门以通耕牧……城四角各有楼，如门制。敌台以座计者二十有四……门外仍建瓮城……北故无门，而楼则与东西南并峙。城外包以砖石，高厚峻整，极为坚致，屹然云朔一巨防也。窺者知其不可犯，号为“铁城”，而边人称城之坚固者，亦必曰蔚州。<sup>③</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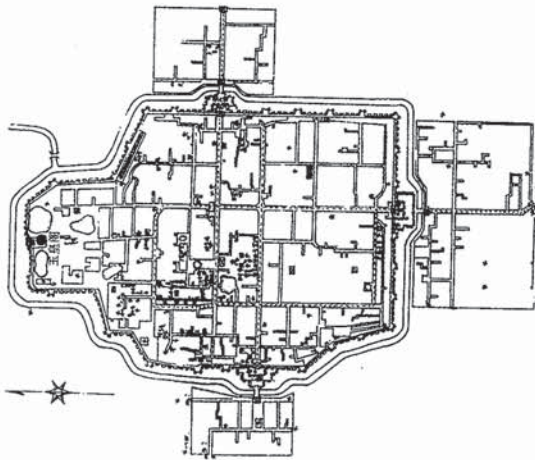
城北垣无门有楼，称“靖边楼”，这也就是后来的玉皇阁。方志中有记载：“玉皇阁，即靖边楼也，在北城垣上，明洪武十年卫指挥周房建。”<sup>④</sup>至于靖边楼何时成为玉皇阁，方志中并无记载。所幸的是在现存的玉皇阁重修碑文中保留下记录。据明万历四十二年所立之《蔚萝重修北城垣玉皇阁神祠碑志铭》中云：“爰命将军周公房创建城池，正北隅树飞楼于其上。迨成祖□□□□□□□□，协戎或孙公成守此，奉玉帝神像于其中。”因碑文字迹不清，无法确定崇祀玉帝的具体时间。清康熙五十八年立《重修蔚州北城玉皇阁碑记》也说道：“有城即有阁，阁因城而建，初未崇祀神也。”而对祀神的时间则有明确说明：“蔚州城垣创建于故明洪武乙酉<sup>⑤</sup>，城楼凡二十有四，独北楼弘整而高峻，意或有所不能起建城之。周将军房于九原而□之矣。正德间，孙公成以协镇守兹土，奉玉帝其中。”

① 乾隆《蔚州志》卷2，“建置沿革”，第99页。  
 ② 光绪《蔚州志》卷1，“历代职官表”，《中国方志丛书》冀北地方第二十九号，台北：成文出版社，光緒三年刊本影印，1968年，第28页。  
 ③ 乾隆《蔚州志》卷30，“艺文·重修城楼记”，第632—633页。  
 ④ 乾隆《蔚州志》卷25，“祠庙”，第518页。光绪《蔚州志》卷6，“祠祀志”，第88页下。  
 ⑤ 洪武乙酉年，明初乙酉年有永乐三年，此处当为误记。

可见，玉皇阁本非神祠，乃是因号称“铁城”的蔚州城的北城楼“靖边楼”中奉祀了玉皇神像才逐渐形成的。“靖边楼”仅从名称就不难看出其中的政治象征意义，御敌守土，安靖边疆，正是明代北方边镇社会的要务。

有明一代，北边防务一直是令明朝廷十分头疼的问题，尤其是宣德以后，蒙古瓦剌部兴起，兼并鞑靼部后，势力日趋强盛。从此，北方边塞，尤其是宣大地区，可谓边尘风起，狼烟在在。究其原因，乃在于“辽东山川险阻，林木茂

密，地方窄狭，虏贼间或侵犯，难于久住；陕西、延绥边备颇固，少见贼人；宁夏恃贺兰山之险；甘肃止一线之路，且屯堡数多，贼人不能大肩背之地的蔚州与蔚州卫，在明中期，尤其是正德、嘉靖年间，屡受蒙古人侵掠，历经战乱。据史料记载，正德九年（1514）九月，“虏五万余骑，自宣府万全右卫新开口入，逾怀安，趋蔚州等处劫掠”<sup>⑥</sup>。嘉靖二十三年（1544）十月，“虏至蔚州洗机利台”<sup>⑦</sup>。嘉靖三十二年（1553）八月，“虏分兵东犯蔚州，西闯



蔚州古城图

（资料来源：《蔚州古城图说明》附图，《蔚县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

① 陈子龙：《明经世文编》卷61，“余肃敬奏·边防·军务等事”，中华书局，1997年，第489页下。

② 《明武宗实录》卷116，正德九年九月壬戌条，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印行，1962年，第2344页。以下所列各朝明实录版本并同。

③ 《明世宗实录》卷291，嘉靖二十三年十月戊寅条，第5584页。



平刑关，入掠代州、繁峙县等处”<sup>①</sup>。嘉靖三十八年（1559）八月，“敌寇顺圣东西川，抵蔚州，攻破城堡十数，杀掠数万计”<sup>②</sup>。这些史籍所记乃规模较大的侵犯，而平时秋收时节，零散数骑前来侵扰掠夺之事更是数不胜数。这些侵扰给蔚州社会造成了很大的危害，如嘉靖三十二年蔚州被犯后，巡按宣大御史毛鹏言：“虏自七月十六日入境，至八月初七日始出，以二十余万之众，经二十余日之久，地方遭其杀戮抢掠，殆无余类……应州、浑源、广昌、蔚州等处被其荼毒，惨不忍言。”<sup>③</sup>而正德年间将玉皇神像奉祀人靖边楼中，大概也是想凭借神佑，保障边地安靖。这样的思想在万历年间的玉皇阁重修碑文中也可以看到：“蔚萝世代雄郡也，摄乎云谷之间……号锁钥重地。”又铭曰：“是建地吼金汤，楼飞轮奐，维皇上帝仁覆群灵，烽燧无警，乐只太平。”

## 二、共襄善举：官军、绅衿、僧道与商民

从现存史料来看，玉皇阁大规模的首次修缮是在明万历四十二年，有《蔚萝重修北城垣玉皇阁神祠碑志铭》存世。据碑文中所称，该役“经始于己亥之季春，落成于甲寅之孟夏”，即万历二十七年至万历四十二年。碑文称，在该次重修之前，玉皇阁已经庙貌残破，可是“蔚士民每动覆篑掘井之嗟，谋所为鼎革者，欲请诸上台而不果”。至山西道士贺清善于万历戊戌春，即万历二十六年成为此阁的住持，遂“日夜跪诵真经，历寒暑不辍，由是声动”，于是各方官绅商民均踊跃捐资助善，由是鸠工聚材，重修玉皇阁。经过大约十五年方大功告成。此次重修工程的规模非常大：

高阁周建，长廊四起，上则玉帝而仙童女仪侍之，下绘诸圣十五龛。巡而南为山门，而外设壁，与门称。内建龙虎殿，直其北峙为坊，而题金匾曰“靖微宫”。无极大帝坊之东西向南为钵堂、畜舍，各三楹。而庖厨、□□厦对立者，各四楹。层而上翼以钟鼓楼，则晨铭月暮敲风者在焉。自内达

① 《明世宗实录》卷 401，嘉靖三十二年八月乙亥条，第 7023 页。

② 光祿《蔚州志》卷 18，“大事记”，第 256 页上。

③ 《明世宗实录》卷 402，嘉靖三十二年九月己酉条，第 7039—7040 页。

外，上下周围，金碧辉煌，琉璃灿漫，龙蟠凤翥，鸟革云飞。<sup>①</sup>

除了重修玉皇阁内的设施外，贺清善又恐焚修无资，难以持久，“故于太平、吉家庄等处创为诸神祠，而置地若干亩，号曰‘香火院’”。虽然我们无从得知此次重修之前，靖边楼在奉祀玉皇神像后，楼阁设施有何变化。但是从此次重修的石文来看，万历年间的这次规模大、历时久的重修，几乎是完成了一座庙宇所需要的所有内部建筑。可以说，经过此次修缮，“靖边楼”才真正变成“玉皇阁”。

此次重修，有大量不同身份的人员参与捐资，并题名于碑阳之末和碑阴。笔者抄录并粗略整理如下：

表 1 万历重修玉皇阁题名情况统计表

类别	身份
州官	赐进士第出身奉训大夫知蔚州事推升户部员外郎、蔚州儒学训导、蔚州儒学学正、吏目
卫官	钦差守备蔚州城地方以都指挥体统行事指挥金事、蔚州卫□□指挥、蔚州卫管屯指挥、蔚州卫巡捕指挥、蔚州卫指挥、本卫掌印管屯千户、致仕千户、本卫掌印百户、桃花堡防守

明代重修玉皇阁碑，有龟形碑座，明万历四十二年立



① 明万历四十二年《蔚萝重修北城垣玉皇阁神祠碑志铭》，《蔚县碑铭辑录》，第 93 页。



类别	身 份
乡贤	第进士第南京户部尚书太子少保、赐进士第巡按陕西直隶江西御史、赐进士第中宪大夫河南怀庆府、赐进士第河南中牟直隶东明知县、钦差镇守薊镇昌平山西等处总兵、钦差镇守薊镇山西宁武等处总兵、钦差镇守辽东兼理备倭总兵、钦差镇守陕西等处驻扎固原总兵、钦差协守宣府驻扎口营堡副总兵、钦差分守薊镇石寨参将、钦差分守山西西北楼口参将、钦差分守薊镇松棚路参将、钦差统领陕西阳游击将军、钦差统领陝西人卫游击将军、山西军政金书城操操都督、乡进士陝西平凉府同知、乡进士陝西虜州同知、乡进士直隶涿州府鹿泉县知县、乡进士陝西平凉府同知、乡进士四川成都府罗江知县、乡进士陝西凤翔府岐山知县、乡进士江西信丰知县、乡进士山东兖州府巨野知县、乡进士直隶德州州城守备、山西草垛山守备、宣府南路坐营、宣府东路千总、宣府东路千总、宣府西路千总、会武进士、武科乡试、乡进士、同学生员、乡耆、监生、省祭、文官、本州木铎老人、施财功德主
外地人或在本地做官的人	宣府镇城人 钦差山东春班游击、钦差山东秋班游击、察院门下官 太原府训导、河南河内县典史、光禄寺署丞、陝西洋县典史、鸿胪寺序班、太原府礼县典史、易州州同、易州仪宾、宣县典史、汝州州判、浑源上盘阳丞、永平府知事、临桃桃阳职职丞、儒官、柴沟堡守备、宣府左卫经历司、金家庄防守、宣府前卫经历司
僧道	署道正司印、本城道人、各乡观道人、本闾下募化重修住持道人、大士庵住持、白衣庵僧
商人	本城铺行（均为商人题名，无商号题名）
普通百姓	本城善众、各乡村善众

通过上面的题名统计表可以发现，此次重修集结了蔚州当地各种人群：首先是蔚州的地方官、蔚州卫的世袭武官，这是州卫地方官的体系。其中，蔚州地方官只有少数人在碑阳末端列名，而碑阴题名中，则列有大量蔚州卫的武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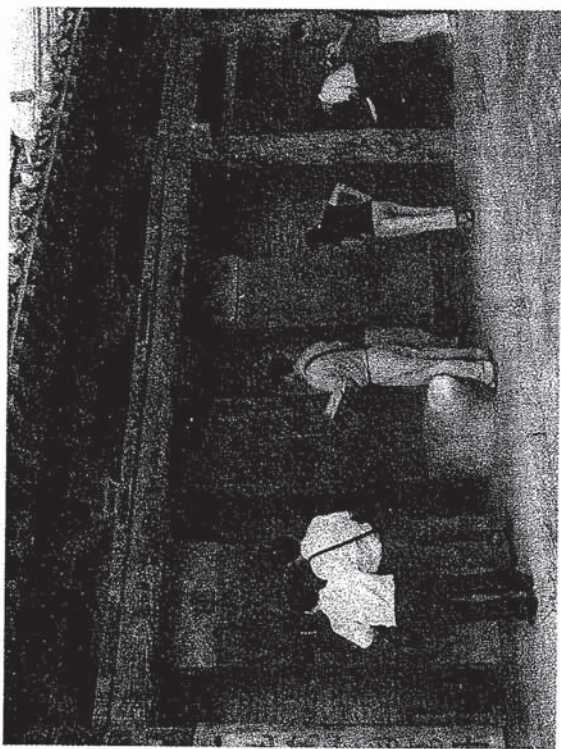
其次是大量蔚州及蔚州卫在乡试、会试中考中功名并在外任官的乡贤、本地生员、各种耆老乡官。如碑阴首行题名者均为蔚州及蔚州卫的地方乡贤，有蔚州籍进士郝杰、史东昌、裴栋、蔚州卫籍进士乔廷栋。这也是当地在嘉、万年间最有影响力的几位名宦。<sup>①</sup>紧随四人之后的是蔚州、蔚州卫籍的文武官员。还有一些外地的文武官员，从方志和武职选簿等资料中都找不到这些人的相关记载，所

<sup>①</sup> 郝杰，嘉靖丙辰科（嘉靖三十五年）进士；乔廷栋，万历己丑科（万历十七年）进士；史东昌，万历戊戌科（万历二十六年）进士；裴栋，万历辛丑科（万历二十九年）进士。参见光绪《蔚州志》卷8，“选举志”，第102页上。

以无法判断他们是否为在外任官的蔚州本地人。

再次就是僧道、商人以及城中和各乡村的普通善众。

从这块重修碑中不难看出，此次修缮规模之宏大，参与人数之众多，几乎涵盖了蔚州及蔚州卫所有人群。尽管在碑文中没有显示出各位善人捐资的具体数额，但是从题名者的数量和列名次序等情况来看，此次万历年间的玉皇阁重修，官军、士绅的力量很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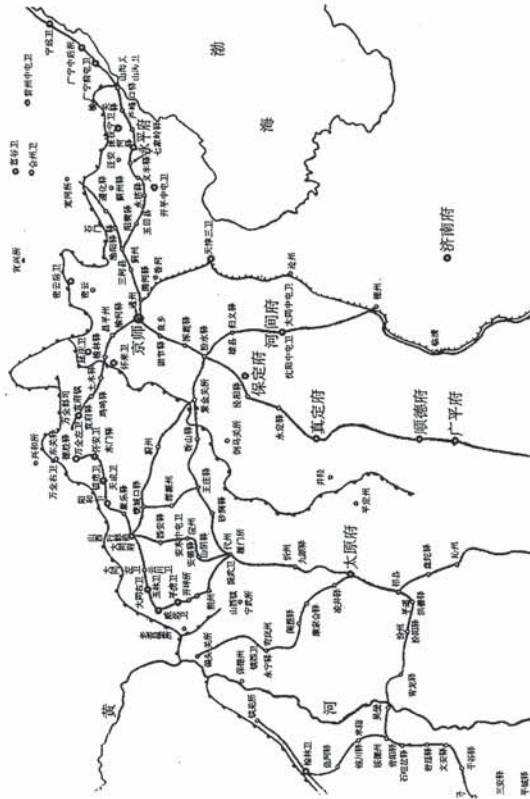
玉皇阁正殿外两端的立碑

自万历年间重修之后，历经百余年的时间，玉皇阁始终未经修缮，至康熙末年才再次修缮，有康熙五十八年《重修蔚州北城玉皇阁碑记》记载此次重修活动。此次重修，乃为住持僧本浩首倡，因不忍见楼阁倾圮，于是毅然募化善金修葺之，“除士民捐赏外，又出自己生平所积之经费六十余金，积三年而工告竣”。知州冯敬玉题名于碑阳之末。碑阴题名除宣镇蔚州路中军守备王道民、宣镇蔚州路援兵营把总李晋锡等武官以及住持比丘本浩和徒弟、徒孙外，其余都是蔚州卫乡村的士绅、铺户商人和普通百姓。以“本城绅衿”题名的多为蔚州及蔚州卫著姓望族的成员，如魏象枢之子魏学诚，暖泉董氏的揆叙、功叙、畴叙、秩序四



前文已述，蔚州在历史上历经战乱，明初，大量军户移民进入，蔚州卫设立。作为北边的军镇要塞，明正德、嘉靖年间，蔚州屡受侵扰。至隆庆和议之后，更为和平安宁的局面使当地的社会经济获得恢复，所谓“世庙之时，俺答无岁不犯，孽孙就糜，六十年人不知兵”<sup>①</sup>，“迨至明兴，虏酋叩关，款塞通贡，隆庆以来，世际清平，闾阎殷富”<sup>②</sup>。蔚州地近边防重镇宣府、大同，其地南部有数个峪口通往山西、内蒙等地，是明朝往宣大运输军需、客商贩卖货物的要道。明代发达的水陆官府驿站，成为商品运输的首要选择。

杨正泰经过详细考证而绘制的《长城沿线驿站分布图》显示：



资料来源：杨正泰《明代驿站考》附《长城沿线驿站分布图》。

从京师出发，南下从良乡、涿鹿，经紫荆关，过蔚州，由此可进入山西，通向大同。另外有从山东德州经河间府、雄县、紫荆关、蔚州至大同的驿路，其间

① 崇祯《蔚州志》卷1，“疆域”，第328页。  
② 明万历十三年《重修关王祠记》，现存蔚县南留庄镇单墩村关帝庙院内，《蔚县碑铭辑录》，第331页。

大河上下：10世纪以来的北方城乡与民众生活

兄弟，以及蔚州卫李氏的李令望、李树望、李德望等人。之下则分别是本城辅行、吉家庄辅行、白乐辅行以及各乡村善众的题名，笔者简单统计如下：

题名	本城绅衿	本城辅行	松枝口	吉家庄辅行	白乐辅行	庄窠堡	百树村	康家庄	裕祉沟
数量	25	65	16	12	8	9	4	8	15

其中，本城辅行的题名中，仍多为商人姓名，而没有商辅的名号，但是有“当行”题名，可见此时当行已经有行业性的联合组织。吉家庄和白乐是蔚州卫的市集，其下所题皆为商辅名号，而极少出现商人姓氏，基本为商辅，也有当铺，可以看出清初蔚州卫属的集镇在商业上也开始兴盛起来。其他各乡村题名的都是普通善众，并无任何功名身份。从各种身份人群参与捐资重修的数量来看，辅行数量约115家，其中当行是以整个行业联合的方式参与进来的，所以辅行总数要多于115家，而绅衿仅25人，还有多人为同宗亲属，各乡村善众总数也仅52人。因此商户的总数已高于绅衿和普通百姓数量的总和。可以说，此次重修中，商人的力量已经逐渐超越了地方官和士绅、普通百姓。

乾隆二十六年（1761），玉皇阁补修配室，至乾隆三十二年（1767）完工，立有《重修城北玉皇阁配室碑志铭》记录修建始末。直隶宣化镇蔚州路参将陈镇国、蔚州知州刘致中等文武官员以及蔚州儒学的生员等列名于碑阳之末。住持道人王□存及其徒、徒孙等人募化善金。碑阴有大量题名，可惜字迹模糊不清，可以隐约辨认的均为人名和商辅。上半部分的题名皆为本城善士和商辅，可以辨认出大量“□□店”、“□□铺”的题名。下半部分为蔚州各乡村的善众题名，隐约可以辨认出东七里河、逢驾岭、东破寨、中石化、北石化、北阳庄、卢家堡、陈家洞、辛庄儿等乡村名称。善人、商辅总数约在2000以上。经领导善人为16位，不是玉皇阁的住持僧道，也不是官宦、生员，可能是下层士绅或者商人。

通过以上描述，大致可以说，万历、康熙、乾隆三次不同时期的重修玉皇阁活动，都由住持僧道首倡并四处募化，有地方官的积极介入，捐资助善者包括了文武官员、地方士绅、商户、普通乡民等，而商户的力量则逐渐突出，这与蔚州地区在明中叶以后商业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



还有经蔚州分小路而北达宣府镇的商路<sup>①</sup>。蔚州南部的几个峪口在明代就已经成为商贩往来频繁之地，如九宫口峪，顺治年间州人张大猷修建九宫口桥，郡人慕源为之撰写碑记，讲到：“蔚郡东南四十五里许，村名九宫口，《广輿记》所载九宫山也。其峪南通荆、马二关、北达云、宣二镇，居人土物，往往兴贩者，蹄踵如织，尤孔道云。”<sup>②</sup>可以看到当时客商走贩的繁盛景象。来往的商贩经由蔚州，而蔚州的物资供给亦逐渐仰赖行商，“锦衲之来自充、豫，橘柚之产于东南，即绵绉迎暑，木棉御寒，尚须取资于商贩。回婢以织，茫如也”<sup>③</sup>。运输工具则是高脚骡驮，俗称骡帮。穿行在深峪，昼夜络绎不绝。据当地人的调查，郑家庄、上苏庄、北口等村，都出现过拥有百条以上的骡帮大户<sup>④</sup>。

进入清代，由于蒙古的内附，加之康熙、雍正、乾隆年间对蒙古各部落的叛乱行动都进行了军事平叛，也抵御了沙俄势力之入侵。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边境线大幅度北移至漠北喀尔喀之外，大同、宣化等明代边防重镇不再处于边防线上，而是成为沟通中原腹里与内蒙地区的重要通道。在康熙三十年（1691）多伦会盟后，应蒙古部众的要求，康熙帝准许内地汉商出长城深入蒙古各地进行交易。随着越来越多的汉商日益深入蒙古各个角落，张家口等昔日的边防重镇逐渐转变为旅蒙贸易的中转站。还有学者考证，至少到乾隆中叶，张家口已经成为中俄恰克图贸易的重要转运枢纽<sup>⑤</sup>。民国时人在对口北六县进行调查时，曾发出如许感慨：

终明之世为边防重地，清由满洲入关，奄有北国，乃设张家口、独石、多伦额尔三理事同知，以听蒙古人民交涉之事。自此烽火不兴，商农聚集，情势与古大异。盖明为屯兵之地，至清以政治统治之也。<sup>⑥</sup>

① 杨正泰：《明代驿站考》附《长城沿线驿路分布图》，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31页。

② 光绪《蔚州志》卷5，“地理志下·津梁”，第67页。

③ 顺治《蔚州志》上卷子集，“方輿志·物产”，第25页。

④ 田永翔：《飞狐古道的今昔》，《蔚县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1987年，第9页。

⑤ 许慎：《清代前期北方商城张家口的崛起》，《北方论坛》，1998年第5期。

⑥ 杨博：《察哈尔口北六县调查记》，京城印书局，1933年，第3页。

伴随着这样的浪潮，蔚州作为通向大同、宣化，再转往张家口，通往归化城的重要通道之一，由于大量商贸的往来、商品的流通，其商业迅速发展起来。从蔚州现存石刻资料来看，乾隆年间的碑刻开始出现大量商铺名号，其种类繁多，数量惊人，主要集中在州城、暖泉和西合营等重要集镇中，而这样的变化也充分体现现在州城玉皇阁的历次重修中，尤其以乾隆四十六年及其以后的数次重修表现得最为突出。

### 三、“四行”与“三行”

乾隆四十六年（1781），玉皇阁再次重修，有《重修碑记》存世。此次重修缘由，按碑文所述，乾隆四十三年时，玉皇阁曾创建戏楼，“同郡善士劝缘募化，创建戏楼，增饰胜景”。但由于“工程匪细，施资无多”，故“丹铅未即”。至乾隆四十六年三月，时任分守宣化镇蔚州路等处地方副总府梦大人“谒庙拈香，戏楼壮丽，山门易旧……坍塌者有之，残毁者有之”，于是“词于董理，前人赔项甚赖，未敢再烦，因于本年三月内约集四行商贾另开缘簿，图彩戏楼，弥补颓废。善感四行唯口而应，兴工于三月之吉日，报竣于闰五月之望时。外观戏楼皇皇也，仰瞻大阁穆穆也”。梦大人，即梦克，据光绪《蔚州志》记载，乾隆三十七年始任蔚州路参将<sup>①</sup>。碑阳之末有“特授蔚州正堂加五级纪录十次王”等地方官员的题名，“蔚州正堂王”即为时任蔚州知州王建中<sup>②</sup>。虽有知州等地方官题名，但是碑阳题名的经领人则均为州城铺户，有“四行”铺户的题名，与碑文相同。所谓“四行”，即钱行、当行、缸行、铺行。经领人四行题名下有钱铺4家、当铺7家、缸房2家、商铺6家。碑阴题名除了大量钱铺、商铺、当铺、缸房的铺户名号外，在碑阴未有四行总共捐资数额，各行均“施钱二万四千一百文”。除四行铺户外，还有大量其他行业的铺户，如油铺、布店、烟铺、衣铺、作房、铁铺、饭铺、纸房、菜房、豆腐、线铺、面粉、饼铺、铁铺等，另有染行集体捐资八百五十文。经过笔者对碑阴的统计，除了缸行、染行等行业性

① 光绪《蔚州志》卷2，“本朝职官表”，第40页上。

② 光绪《蔚州志》卷2，“本朝职官表”，第33页下；“王建中，云南剑川州人，拔贡生，（乾隆）四十四年任。”



组织联合题名外，尚有独立铺户 236 家题名，还有一些商人题名。

此次玉皇阁重修，与前几次有一些明显的不同之处：不是由住持僧道倡募，也未见他们的题名；由地方长官出面“约集四行商贾”出资修缮；捐资助善者中，官员、士绅几乎完全消失，商人成为资助玉皇阁重修的唯力量。之前的历次重修，虽有商户参与，但未见以同行业组织的集体形式出现，此次则已明显见到同行业聚合的趋势。

而钱、当、缸、铺四行的几大商铺作为经领者，成为此次捐资助修玉皇阁的各行商户的代表。这与乾隆时期四行在蔚州各行中力量的突出有关，这一特点亦可以蔚州城中财神庙为例。

蔚州城内有财神庙一座，位于城西北隅，在蔚城鼓楼后的双松禅寺后面。该寺的建筑现在还保存着，但是庙里的塑像及摆设已经无存，不过还保留了许多碑刻材料，而这些碑刻材料集中反映了清代中后期蔚州城内的商铺数量、种类及行业的发展情况<sup>①</sup>。

从碑文来看，该财神庙修建时代不祥，方志中也未注明。崇禎《蔚州志》中所记城中各祠庙，未见有该庙的记载<sup>②</sup>。在乾隆四十三年《财神祀典碑记》中说，九月十七日在该庙中“恭奉财神祀典，由来旧矣。”由此看来，该庙可能建于清前期。从该碑的内容来看，财神祀典曾一度因“经费缺乏，几几有废坠之忧”，于是年“七月二十二日增福财神诞辰”之时，众善人等“祭祀之举，诚盛事也。但善念易起，独力难成。只得募化合郡绅衿与诸铺户，共化大钱百千有馀。诸铺使用此钱者，每年一分行息，以为历年两辰补助之资，庶祀典永久不至废坠”。据笔者统计，在总计 90 多家铺户题名中，数量最多的是钱铺 32 家、商铺 25 家、当铺 13 家、缸房 8 家，其余的是烟铺、油铺、银铺、线铺等。而数量最大的钱、商、当、缸正是乾隆四十六年玉皇阁重修碑中提及的“四行”。

乾隆四十七年，财神庙因庙产纠纷，曾诉讼至知州处，立有香火地凭据碑一

<sup>①</sup> 这些碑刻包括：清乾隆四十三年《财神祀典碑记》；清乾隆四十七年《财神庙立凭据碑记》；清嘉庆九年《重修财神庙碑记》；清嘉庆十五年《财神庙捐办庆云会碑记》；清道光六年《重修庙碑记》；清道光十八年《创修庙正殿院碑记》；清道光十八年《财神庙布施碑》；清光绪三十二年《重修财神庙碑记》。以上各碑现存蔚州县城财神庙院内，收入《蔚州志》第 130—157 页。

<sup>②</sup> 崇禎《蔚州志》卷 3，“祀典·寺观附”，第 480—483 页。

通，碑文中说：“钱行李永盛、当行高恒隆、铺行萧金生、缸行高明，财神庙有住房一所，讨租作为香火之资。”后来，该庙住持将这所住房转卖他人，再辗转出卖多次，“四行备原价贰万文，不能赎回，致控在案。蒙州王太守断令，四行出银肆拾两，将此房从李正名下赎回，仍作香火，日后住持不得再行质卖”，并责令“质过此房者献出旧约、旧契，以作故纸。不与财神庙与四行相干，从今后此房永作财神庙七月二十二日、九月十七日两会之资用，不得质卖，外人不得覬覦”<sup>①</sup>。可见乾隆四十三年《财神祀典碑记》中所讲的财神祀典的经费是由钱、当、铺、缸四行铺户的房租共同支付的。这些都可说明四行在蔚州各行商户中具有的地位。

玉皇阁在乾隆四十六年由四行出资修缮后，直到道光二十五年又再次重修。据当年所立《重修玉皇阁碑记》中说，特授直隶宣化镇蔚州路等处地方都阉府王秀龙目睹玉皇阁“世远年湮，风雨倾圮”，心生感慨，意欲重修，“因百姓之有余闲，天下之无事，乃诏三行各捐资，以兴此工。其于弊者补之，废者兴之，缺者修之，故者新之，共费大钱二百余千”。碑阳之末有蔚州知州陈嘉谋等地方官施银的题名。碑阴题名除蔚营百总孙继先施钱 2000 文以外，就是城乡商行、当行、货行三行的捐资题名。其中缸行是整行集体捐钱 61000 文。当行、货行则列出捐钱铺户的名称。督工经理人是三行的几家铺户，货行 3 家，当行 2 家，缸行 4 家。

此次重修与乾隆四十六年的那次重修相比，同样是地方官诏令各行商户捐资助善，但却从经领的“四行”变成了“三行”，钱行退出。在以后的玉皇阁重修中，钱行各铺均未见再有列名与善。钱行为何退出？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尚不能材料加以说明。但是同样可以用财神庙的例子与之讨论。

前文已谈到财神庙两通乾隆年间碑文中表现出来的“四行”的活动，道光六年，财神庙重修，所谓“土庶商贾人等公议补修，募化者不殫其劳，督工者不辞其瘁”。而此次重修的经领铺户列名有 10 家，除 1 家为烟铺外，其余均为钱铺。碑阴也有大量钱铺商号题名，此外还有很多行业的商号，如线铺、饼铺、油铺、肉房、染房、帽铺、皮铺、木铺、纸房、锻店、盐摊等等。虽然也有几家缸

<sup>①</sup> 清乾隆四十七年《财神庙立凭据碑记》，《蔚州志》第 133 页。



行、当行的商铺题名，但是占的比例非常小。<sup>①</sup>虽然没有更多的材料说明，但是从这些碑文反映的现象来看，似乎可以说钱铺从修缮玉皇阁的“四行”中退出，再作为主要的经领商户，与一些“四行”以外的不同行业的商家一起，转而在财神庙中进行重修、祈福等活动。这应该是一个行业间权利重新分割的过程，但是具体情况还需要我寻找更多的材料进行分析。

#### 四、商人之庙

光绪二十三年（1897），玉皇阁再次重修。首倡此事者为时任蔚州知州张谐之、蔚州路等处地方都阉府王承陞。二人“分派经理，劝谕本城及各集镇行户，踊跃输将，共襄善举。工起于三月初九日，至九月初九日告竣”。此次重修，王承陞认真督役，“都戎王公监督花材，每晨必诣，以故大工不日告成”。经领人为本城士绅和当行、货行的一些铺户，“经理绅士：贡生刘锡之、举人刘彦魁、段养志；当行：大生当、元亨当、丰顺当；货行：惠贞裕、德本裕、瑞锦裕、谦盛益、泰顺亨、福聚长、全成义、万兴源”。从碑阴题名来看，此次重修的捐助者主要是蔚州城中以及集镇的各个行户。<sup>②</sup>

表 2 光绪二十三年重修玉皇阁捐助名单<sup>③</sup>

地点	铺户种类	总数量	其他捐助者
西合营	货行、缸房	37	
代王城	缸、当、货	众行	
桃花堡	缸、当、货	众行	
白乐堡	缸、货	众行	
吉集白乐	麻行	众行	
北水泉	众行户、缸房	众行、缸房 2 家	武生 1 人
吉家庄	当铺、货行、缸房、饼铺	16	人名 2

<sup>①</sup> 清道光六年《重修庙碑记》，《蔚县碑铭辑录》，第 144—147 页。

<sup>②</sup> 清光绪二十三年《重修蔚州北城玉皇阁碑记》，《蔚县碑铭辑录》，第 124—127 页。

<sup>③</sup> 据清光绪二十三年《重修蔚州北城玉皇阁碑记》碑阴题名整理，《蔚县碑铭辑录》，第 127 页。

地点	铺户种类	总数量	其他捐助者
牛大人庄	货行	2	武生 4 人
暖泉	当铺、货行、缸房、油房	78	
蔚城	当铺、货行、缸房、木店、盐店、烟摊、漆店、染行、纸行、粟店	180	武童附生 5 人、捐贡 1 人、众善士

续表

在碑阴题名中，代王城、桃花堡、白乐堡都是缸、当、货等行集体捐资，并未单独列出铺户名称。其他有些行业是整行集资，有些行业则为铺户单独捐资。其中吉集白乐和牛大人庄并非清中后期蔚州的八大集镇。吉集白乐在方志中并无记载，牛大人庄是蔚州东部的一个村庄。按照后人的实地考察，该地至少在嘉庆年间就开设了缸房，在清末时一度非常兴盛，并带动了商业贸易的发展。<sup>④</sup>

就在光绪二十三年重修玉皇阁工程进行时，经领绅士刘彦魁、刘锡之、段养志等人开始虑及众行户所捐资产恐为阁中僧道占为己有，遂联名向知州张谐之稟称：

窃蔚州旧俗，凡有庙宇当修建时，虽系十方费财，而现在住持或僧或道，率将其名刊碑、铸钟，所有本庙出息，如同世产，使子徒孙永远占据，纵有匪类，亦难更换，以故若辈有恃不恐。本城玉皇阁巍据北城，与寻常祠庙不同，乃因年久倾圮，派人经理。劝令城集铺行捐资重修，现在规模大定，不日告成，善后事宜，首在住持，若不预拟新章，作何安插？恐若辈仍蹈故辙，大为不便。伏思此次重修，既系行户捐资，自应行户经管。所用住持如果恪守清规，本庙出息足供养赡；倘有非分不合，许该管铺户公议另换。方期允协，将来工竣立碑，亦不准镌刻住持僧徒名字，以杜日后架辞占据诸弊。请出示谕飭等情。<sup>⑤</sup>

<sup>④</sup> 周清溪：《蔚州酒乡——牛大人庄酿酒历史的追溯》，《蔚县文史资料选辑》第 5 辑，1992 年，第 67 页。

<sup>⑤</sup> 清光绪二十三年《蔚州正堂加十级纪录二十次出示晓諭事》，《蔚县碑铭辑录》，第 121 页。



知州张楷之“据此查此庙与城池攸关，经此次重修之后，自当善为看管，不令废弛。据禀前情，杜渐防微，可期经久之道，应准如所请，以昭慎重”。除禀批示外，又专门出示晓谕，以令各该铺户知悉：“嗣后玉皇阁专归尔等铺户经理，住持僧道亦归各铺户公议择用，与僧道无涉。工竣时所立石碑，亦不准镌刻住持僧道名字，以杜弊端。倘该庙住持僧道或有不守清规者，许该铺户等随时驱逐更换，慎勿养痍贻患，置之不管，其各永远遵行毋违。”并立碑为凭。该晓谕碑的碑阴尚列出玉皇阁所有的地产数处，并规定“以上房地久为养贻，不准住持擅行质卖”，“如敢故违，着经理行户呈禀法究”<sup>①</sup>。

从这块晓谕碑中不难看出，光绪二十三年玉皇阁的重修乃是由“城集铺户捐资重修”的，因此由知州出面颁示晓谕，将玉皇阁及其庙产的管理权均下令归属各行户所有，不允许住持僧道干涉这些事务，而且住持僧道的选择也由该管各行户负责。

## 五、余论

从地方志现存的玉皇阁重修碑等资料，我们基本可以勾勒出玉皇阁从明初洪武十年始建，至清末光绪年间重修的大致过程。从历次重修的碑文中可以发现，伴随着明清时期蔚州社会的变迁，玉皇阁的管理也发生了变化。所谓管理，只是笼而统之的说法，包括了历次重修的提倡者、经费的来源、工程的督管经领人、庙产的控制等等。玉皇阁是由蔚州卫指挥使兴建的，其后始奉玉帝入阁者也是卫官。万历年间的重修是由住持道人贺清善首倡的，但是参与重修的有大量州卫官员。州官数量较少，仅有知州、学官、吏目数人；蔚州卫武官数量非常多，本卫掌印指挥、管屯指挥、巡捕指挥三人列名于碑阳之末，碑阴则有先后任过本卫指挥、千户、百户的武官，还有在外担任武职的蔚州卫官户。本州的乡贤、耆老、僧道、普通百姓、州城中的商人都参与进来。这次重修几乎动用了蔚州所有群体的力量，是一次大规模的地方活动。由于有大量的地方文武官员和上层士绅的加入，使得玉皇阁的此次重修带有浓厚的官方色彩。可以说，从明初产生于卫所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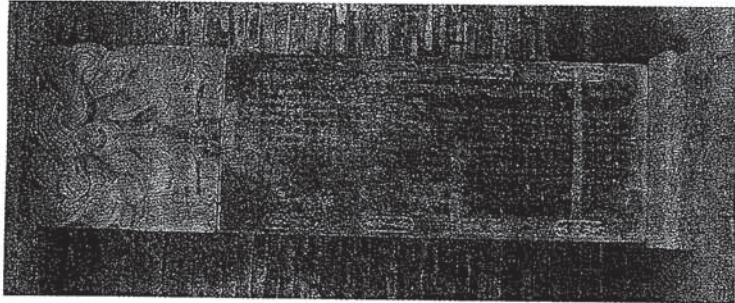
<sup>①</sup> 清光绪二十三年《蔚州正堂加十级纪录二十次出示晓谕事》，《蔚县碑铭辑录》，第121页。

官之手，至万历重修，州卫官员的积极介入，玉皇阁已经从卫所军官创建的庙宇变成一个州卫合作的官军之庙。

至清康熙末年，玉皇阁再次重修，仍是住持僧本洁首倡，四处募化。知州冯敬玉题名，宣镇蔚州路的参将、守备、把总等武官捐资题名。蔚州一些名门望族的乡贤以及州城、集镇的铺行和乡村的善众也捐银。到乾隆年间，捐资重修、负责经领玉皇阁重修的主要是蔚州的四行商户。到道光时的重修，虽然是知州、都阉府等地方官首倡，但从捐资和督工经领人来看，都是蔚州城乡三行的各个铺户。此外三行，为货、当、缸三行，比之乾隆时的四行，少了钱行，碑阴题名中也确实没有钱铺，说明此时钱行已经退出了玉皇阁的捐助和维修活动。

到光绪末年，仍然是知州等地方官首倡，并派人劝谕本城及各集镇行户捐资，经领和捐资的也主要是各家铺户，还有少数士绅。同时，通过经领士绅的募请，知州判令，将玉皇阁及其庙产的管理权都归于各行户，住持僧道不得干预。至此，玉皇阁已经基本成为一个商人的庙宇，由商人捐资生息维持，庙产房地均属该管铺户所有和经营。

从上面的描述来看，玉皇阁从蔚州卫指挥始建到州卫官军民合作再到完全由商人经营管理，简单描述，可以说经历了一个从“官军之庙”到“商人之庙”的转变。这一过程正是明清蔚州社会变迁轨迹的一个缩影。明初设蔚州卫后，卫官承担了州城内许多公共设施的修筑，如城墙、敌楼、祠庙、衙署等，作为边防要塞，卫所武官的数量和势力都是比较强的。随着边患从频仍到渐息，卫所武官与州官、卫所与州的乡绅开始合作参与地方公务。到清初，卫所武官已经逐渐退出了地方的公共活动，取而代之的是营官与州官合作。到卫所改县后，知县也从



清光绪二十三年蔚州正堂出示晓谕碑，有碑额，长方形碑座



未参与过地方活动。原卫所系统下的武官后裔因为身份的变更，也逐渐淡出地方活动的舞台。到清中期，随着蔚州从军事重镇到商业孔道的转变，商人力量兴盛，逐渐取代官、绅，成为地方活动中最活跃的一股力量。玉皇阁的修建集中反映着蔚州在明清北方边塞社会历史大变迁中经历的变化，包括行政区划调整下社会的人员构成、社会历史变迁下的权力关系变化。

不仅在庙宇维修过程中的首倡人、管理者、捐资方在发生变化，从明初兴建到清光绪年间的知州晓谕，还可以看到这座玉皇阁被当地人赋予的象征意义和功能在发生变化。

在明初蔚州卫指挥使周房修筑蔚州城墙时，在北城垣上修建“靖边楼”，本不祀神于其中，它的象征意义正如其名“靖边”，是蔚州“铁城”的北沿，是抵御敌寇，安靖边镇的军事防御建筑。至正德年间，宣府前卫指挥使孙成奉玉帝像于该阁中，始成玉皇阁。而孙成奉玉帝像于其中，也是因为玉帝“监观有赫，法施于民，御畜捍患，盖百神之主，而万姓实式灵之”，也因此，蔚城才能“□□屹然，金汤天堑，方内外号蔚曰‘铁城’”<sup>①</sup>。

至清代的几次重修，在碑记的文字中，虽然还保留着对明初城建阁的历史记忆，但是对玉皇阁的看法，已经不再是军事上御民捍患的意义，而是顺应时代的发展，被不同需要的人们赋予了不同的意义。

康熙年间的重修，玉皇阁及阁中的玉帝被碑文撰写者赋予了某种抵御水患的神力：

城北有河名壺流，萦绕回环，抱城如带。近乃水势南徙，逼近城下。□者忧之，忧在城也。郡守冯公敬玉、邑侯寇公原然，常登阁审视，慨然出帑金若干，筑堤防御，告神兴工之谏。忽一日，雷雨大作，河水自徙而北，堤遂成，而城永□。人耶？神耶！乃亦在戊戌、己亥之间。因并记之，以见咸暨兴废之有数，而神庥之广大弘深不可拟议也如此。<sup>②</sup>

① 明万历四十二年《蔚萝重修城垣玉皇阁神祠碑志铭》，《蔚县碑铭辑录》，第 93 页。  
② 清康熙《重修蔚州北城玉皇阁碑记》，《蔚县碑铭辑录》，第 101 页。

乾隆以后的重修碑文中，玉皇阁则越来越多地被视为蔚地的游览胜境，被赋予了当地标志性的人文景观的意义。如称：“蔚郡城北□武之位，以其雉楼为玉皇之阁，迤邐下城，供地人之游览。”<sup>①</sup> 又称：“玉皇行宫森列于上，且下有清波漾洒，塞竹盘结，山川之秀，日月之光，毕萃于斯，洵边城之大观也。”<sup>②</sup> 道光年间，撰写重修碑文的蔚州举人蒋殿英已经忘记了明初周房修建城池和玉皇阁的历史：“蔚郡城北垣玉皇阁，不知建于何年，自前朝以至今日，重修已经数次矣。”对玉皇阁的描述完全是对景观建筑物的介绍：“斯阁也，远眺则山列翠□，云霞之所沃荡；俯凭则水环玉带，波涛之所漾潏；西瞻则雉堞旋绕；东望则平阜环迎。迁客骚人多会于此，信蔚郡之胜地也。”<sup>③</sup> 方志中也收录有李予望等本地文人所写玉皇阁的相关诗词，也是以风景之类的描述居多<sup>④</sup>。

光绪年间重修玉皇阁的碑文中有一段描述很准确地勾勒出了这一变化：

蔚系古灵邱地界，在云谷之间，为塞北出入孔道。明初周指挥虑守望之不足恃也，乃改建砖城以资坚壁；又建敌楼二十余座，以资瞭望，故当时有“铁城”之目。我朝承平日久，民视敌楼如无物，久失修理。惟北城玉皇阁康熙丁酉年重修一次，故诸楼尽圯而此阁独存。自咸丰年军兴以来，河南伊公乃重修城垣。同治年奉天李公又重修东西西南三关门楼。独此阁未逮议及，今又数十年矣。<sup>⑤</sup>

正是由于蔚州所处历史环境的改变，使得其从一个经常面临北方民族势力入侵的北方边塞，变成一个承平日久、了无战事的内地州县。而玉皇阁作为明蔚州城垣北端的宏伟建筑，因其正对北方，供奉玉帝，设有可以瞭望敌情的敌楼等等原因，使得其在明代具有很浓厚的防御外患的军事上的实际功能和象征意义。伴

① 清乾隆三十二年《重修城北玉皇阁配室碑志铭》，《蔚县碑铭辑录》，第 105 页。

② 清乾隆四十六年《重修碑记》，《蔚县碑铭辑录》，109 页。

③ 清道光二十五年《重修玉皇阁碑记》，《蔚县碑铭辑录》，第 115 页。

④ 如李予望《玉皇阁远眺》云：“杰阁巍巍俯万峰，遥岚争吐玉芙蓉。清波一市周城水，翠黛双擎偃盖松。西望雄关连倒马，南临古塞隐庐龙。凭栏且放看山眼，身到云霄最上重。”光绪《蔚州志》卷 6，“祠祀志”，第 88 页下。

⑤ 清光绪二十三年《重修蔚州北城玉皇阁碑记》，《蔚县碑铭辑录》，第 125 页。



大河上下：10世纪以来的北方城乡与民众生活

随着清代蒙古的内附，边患的偃息，蔚州的城池、敌楼都失去了其原有的军事防御功能，玉皇阁也不例外。但是由于建筑风格峻伟高整，玉皇阁逐渐转变成蔚州当地的著名景观，供人游览，文人骚客在此赏景吟诗，抒发思古颂今之情怀，所谓：

蔚地不乏胜景，孰如此阁居高眺远，四野风景，指顾瞭然。东望摩笄山代王故城，基趾犹在；西望灵邱赵主父之墓，依稀存焉；其南则飞狐、倒马诸关，想山后杨家备兵屯粮处，历历可指；而其北则有奉圣川故迹，盖皆古之用武地也。概自石晋以燕云十六州界契丹，蔚列其内。历宋、元、明数百年，无日不在金戈铁马中。惟我朝二百余年，风鹤无警，驿马不惊，吏习其治，民乐其生，盖天下之平久矣。<sup>①</sup>

可以这样说，一个北方边镇从“用武之地”到“商贸孔道”的历史变迁，以及由此带来的地方社会权力网络的变化，无一不在这玉皇阁数百年间从创建到重修的历史过程中得到展现，后人从城北巍然耸立的玉皇阁中就可以窥见这座古镇的历史。这也提醒我们研究者思考，究竟应该怎样书写诸如蔚县这样曾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成为北方军事防御边界线的边地的历史。过去的研究常常将这些区域放置在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汉民族与非汉民族之间的和平、战争与贸易关系的宏大叙事框架中加以理解。这些研究成果在笔者看来，从未摆脱传统政治史的观察视角和书写模式。难道这些地区数百年间的变化只能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中给我们呈现这样一个大致的轮廓？当我们用区域社会史的角度对一个具体的边塞城镇乡村进行细致研究时，就会发现，当历史被放置在区域社会的内在历史文化脉络中看待时，传统的边疆史叙事根本无法容纳这些地区丰富多样的历史内容。

<sup>①</sup> 清光绪二十三年《重修蔚州北城玉皇阁碑记》，《蔚县碑铭辑录》，第125页。

## 宗族建构

